

我的大爹

韩天航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养 父 1

母亲和我们 65

我的大爹 149

后 记 214

养 父



只有还保留一份本真的人
才能解释什么叫活着……

——摘自读书笔记

到上海那年我刚满十八岁。上海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可当我想起一生下我就离开人世的妈妈就出生在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她的十八个春秋时,我对上海就有了一份很特殊的感情。那一年的秋天,天上正在下着霏霏的细雨,当姍梅阿姨领着我和养父沙驼顺着人流走出月台,眼前展现出闪烁着万盏灯光的夜上海时,我的这种感觉就变得格外的强烈!而这时我想到了妈妈,竟会鼻子一酸,眼泪也就在眼眶里转了几个圈。

上海正像我在电视中看到的那样,满眼都是人流和车流,满眼都是高楼大厦。我看到养父下意识地捏紧旅行包,眼中也喷射着新奇、兴奋、激动的光亮。五十刚出头的姍梅阿姨已显得十分苍老,她行动已不大方便了,走路时两腿发颤似乎有些支撑不住她那虚胖的身子了。她的身体状况比她在信中告诉我们的还要糟糕。在新疆,她是我妈最要好的姐妹。初到新疆时,她俩在农场场部惟一的一家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我妈留给我养父后,他一直珍藏着。我也是通过这张照片才知道我妈的模样的。她俩都穿着军装,戴着圆软军帽。照片上的我妈是那樣的青春、漂亮而迷人,姍梅阿姨也长得挺秀气。但现在姍梅阿姨的秀气,已被流淌过去的艰难而困苦岁月给消磨掉了,她那双大眼睛的四周聚拢着成堆松弛的皱皮。我听养父说,

她是个很要强的人,在农场她干什么活儿都不肯落后,哪怕是怀着身孕。队上的每一次大突击她都不肯落下,还专挑重活累活脏活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她流过两次产后就落下了不会再生育的病。她丈夫是个拖拉机驾驶员,三十五岁时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姍梅阿姨就再也没有结婚。在她年过四十时,就明显地感到年轻时大量透支生命所造成的后果,以前落下的多种疾病越来越严重地折磨着她,四十五岁后,她已无法再干农场里的任何一样农活了。于是她只好提前退休,孤身一人回到上海。根据政策她在上海落了户,与也是孤身的母亲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她母亲就去世了。由于她是提前退休的,她那很微薄的退休金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已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她只好推着辆小车,每天清晨在弄堂口摊煎饼果子卖,以维持生计。

姍梅阿姨是初中刚毕业就被动员到新疆去的,那时她才十六岁。她说,当时她认为这是件很光荣的事,但现在她才感到那一步整整耽误了她的一生,也决定了她现在只能卖煎饼果子来度过自己的晚年。然而她也没有多大怨言,她是个心地善良,性情温柔,为人热情又很讲义气的人。当时,我妈比她大两岁,但从小娇生惯养的我妈不大会照料自己的生活,所以到新疆农场后,是姍梅阿姨时时地照顾着我妈。养父和姍梅阿姨一直在一个生产队里干活,所以当养父收养我后,她也时常关照着。养父说,我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时正值严冬,养父每天必须赶着马车到戈壁滩上去拉柴火,要不有些家庭分不上柴禾就会挨冻。是姍梅阿姨在医院的病床边整整守了我一个星期,大约是医生时不时地向她暗示我可能不行了的消息,结果那些天她眼泪流了两大盆,人也瘦了一大圈。养父一提到这事就感动得眼圈发红。

姍梅阿姨到上海后也常记挂着我,经常来信询问我的情况。有一年,她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们,说现在上海有条政策:凡是上海支疆

青年的子女,可以有一个上海落户;我妈是上海支疆知青,因此我也可以回上海落户的。我看了信后既兴奋又激动,我就对养父说,爹,我想回上海。养父也为我高兴,他说,你妈临终前就留下过话,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你送回上海。但养父又说,上海我们肯定是要回的,但怎么个回法,明天我得到场部去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政策。养父是个说做就做的人,第二天一清早就去了场部,回来后告诉我说,因为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办起来会遇到许多困难,到上海后恐怕一时半载也办不成。养父说,你正在上高中,学业不能耽搁。小娜,你看这样行不行,等你高中毕业,咱们就考上海的大学,考上了,咱们就风风光光地去上海,要是考不上,咱们到上海后就按政策要求的手续,一条一条地争取着去办,反正你妈是上海支疆知青,这点不会假!

我觉得养父想得挺周全,讲得也挺有理。

当我高中快要毕业时,养父就开始着手准备陪我回上海的事。刚好姍梅阿姨又来了封信,催我赶快回上海,她说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说不定哪一天她一撒手走了,谁也不会再周旋着帮你办在上海落户的事;那时,你妈田美娜会在九泉之下埋怨我和你养父的。养父看信后眼圈也有些红。

那年我高考的总分离进上海大学的分数线只差几分。养父说,不错,咱们回上海后明年再考。我们着手要回上海了,养父一次次地跑场部,去办我回沪落户所需要在这儿办的有关证明材料。他又把自己承包了多年的果园转包了出去,然后在银行里办了一张卡,把自己一生积蓄下来的大部分款项打进了卡里,准备为我在上海落户的事打一场“持久战”。等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办妥后,新疆已是一片秋风萧瑟,枯叶飘零的景象了。可上海想不到竟还是那样的温暖,雨水把空气也渗得润润的。

我养父出生在甘肃永昌县的一个穷山沟里,那儿虽然贫困,却有

不少读书识字的人。养父的祖上听说也是秀才一类的人家,他四岁时他父亲就叫他读书识字了。但由于家乡实在太穷,他十二岁那年父亲就让他独身闯荡江湖去了。说树挪死,人挪活,守着个穷山沟一辈子也还是个穷!干嘛不去试试另寻个窝?养父跑过西北五省的好多个城市,甚至去过西藏的拉萨,在二十几岁时,他终于在新疆的一个农场落了脚。那时到处都有饿死人的事,只有在新疆农场还能填饱肚子,而且他也想过安定一些的日子了。养父年轻时长得很英俊,大而略带点蓝的眼睛,自然卷的头发,笔挺的鼻子,青青的络腮胡子,结实宽厚的胸板。现在虽已年过五十了,但英气犹存。他表面上看似木讷,其实骨子里却精得很;他为人憨厚,极重感情,但有时脾气却挺倔。为了我,他至今没有结婚,虽然曾经有过一次很好的机会。

养父收养我的过程是带有些传奇色彩的,每当有人提到我妈时,养父的眼中就会发出奕奕的光彩,满含着眷恋的深情,但埋在他心底的这份很深很浓的情感仅仅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扎下根的。那是我妈到新疆农场后的第二年的六月,正是沙枣花盛开的时节,整个农场飘溢着一股浓烈刺鼻的沙枣花的香气。当棉花长出三片真叶时,棉田就该浇第一遍水了。那天全队集中劳力在棉田突击修毛渠。我妈碰巧和养父同修一条毛渠。养父说,当时我妈那光彩照人的形象使他不敢多看她一眼。我妈是个活泼、大方、爱说、爱笑、爱跳、爱唱的姑娘。她主动同他说话,问这问那。但事后养父说,她问了他一些什么,他同她说了些什么,他可真都不记得了。我妈同他说话时,挨着他干活,他只感到异样的兴奋和愉快。干了几个小时的活后,我妈的手磨出了紫血泡,我妈一点也不娇气,用手绢扎了扎手就继续干活。养父说,那时他挺心疼她。他想,反正是两个人同修一条毛渠,他多干上些她就可以少干些。于是养父就脱掉褂子,裸露着上身,埋着头一鼓作气就把毛渠修好了,浑身鼓起的肌肉上渗满了油汗。当歇口气时,他

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小腿被砍土曼划破的一道口子在流着血。我妈就解下她扎手的手绢，翻出干净的一面为他包扎好伤口；还称赞他说，沙驼，你真是匹沙漠里的骆驼，又有劲又有耐力！养父听了心里不知有多滋润！养父说，尤其是你妈在包扎伤口时那手轻轻地捏着他的小腿的那种感觉他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当时养父激动地对我妈说，田美娜，以后有啥要叫我帮忙的尽管说。我妈也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可从此以后，他俩再也没有在一起干活的机会了。因为第二天，场部宣传股来人，把我妈调到场部的业余演出队去了。

也许，连我妈自己也不会想到，表面上看，她从最底层的大田调到场里的业余演出队那是命运的好转，可实际上却是厄运的开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先是被场里一位主要领导玩弄了，后来又被演出队的指导员侮辱了。接着在短短的四年里她两次结婚两次离婚。我妈能歌善舞美丽动人，在台上演出时弄得多少男人为她倾倒从而在全场闻名。但我妈的那些丑闻也在全场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上海我妈的家里。为此我那自幼家教极严、面子观念又很重的外婆差点要跳楼自杀。然而我妈的这类丑事却仍然接连不断地发生。第二次离婚后，我妈就从演出队下放到她原先的那个生产队接受劳动改造，可两年后我那没有再婚的妈妈的肚子竟鼓了起来，不管领导对她施加多大的压力，甚至强制性地把她拖进医院，可她发誓说，要想拿掉这孩子就先拿走她的生命。于是在生产队的一间破烂的地窝子里，在一个天即将黎明的时刻，我妈把我生了下来。但没过几个小时，我妈也就离开了人世。在她临死前，她把养父叫了去，说，沙驼，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养父说，一直在心上刻着呢！我妈说，那你就帮我把这孩子带大，以后要有机会，你就把她送回上海，送到她外婆那儿，如果那时她外婆还活着的话。我妈含着泪又非常真切地说，沙驼，当初我该嫁给你……每当养父想起我妈的这句话，他就会激动

得满眼都是泪花。

我妈走后，姍梅阿姨在整理和收拾我妈的身体时，发现她身下的棉垫全被鲜血浸透了。我妈是……养父紧抱着我，整整好几天眼泪就没有干过。

二

绵绵的秋雨在我眼前飘散着，上海的初秋要比新疆暖和多了，湿润的风虽有些凉可吹在身上也是柔柔的。姍梅阿姨拦了辆出租车，车轮在满地都反射着五颜六色的灯光的马路上嗞嗞地响着，路两旁涌动着撑着伞的人流和灯光亮得像白天一样的商店。这时我心头突然渗出一股甜蜜蜜的激情。眼前这情景仿佛我在很早很早以前就熟知了的一样。我妈去新疆和我回上海都是十八岁，仿佛有谁在冥冥之中故意做了这样的安排似的。

车拐进一条小马路后两旁就看不到商店了，行人也稀少了。不久，车开入一条弄堂，在一栋老式的石库门房前停住了。石库门房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姍梅阿姨住在天井右角上的一间只有十四平方米房间里。里面置着几件老式而陈旧的家具，但收拾得很干净，进门要脱鞋换拖鞋。我们的到来使姍梅阿姨感到很欣慰。回到家后夜已有些深了，姍梅阿姨非要出去买点点心给我们吃。我就陪她去了。上海的小吃市场很是热闹，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在路上，姍梅阿姨牵着我的手说，小娜，我真怕你们不回来……说着，捂着鼻子哽咽了好一阵。

天井在漏雨，水滴落在长满绿苔的石板上发出丁丁冬冬的声音。

养父猜测得不错，我要在上海落户将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姍梅阿姨说像我这样的落户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本人一定要是上海支疆知青的子女，可我是我妈的私生女，身份不怎么合法，虽然我们来时由农场出具了证明，但还需要我妈家尤其是直系亲属的认可，但我外婆知道我妈在新疆所犯下的那些丑事后，已坚决不认我妈是她的女儿了。她说，我没有这样的女儿！我妈还有个妹妹叫田丽娜，但她也根本不承认我妈有我这么个女儿。她回答姍梅阿姨说，咯个小姑娘同阿拉勿搭界，啥人晓得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姍梅阿姨说，我妈的亲属不肯认我，那么其他的两个条件，就是第二要有住房条件，第三要有监护人，也都不具备了。虽然我们预料到这事办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但我们还是感到了很大的失望。姍梅阿姨就宽慰我们说，你们先在上海住下来，事情我们慢慢地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小娜是田美娜的女儿，这事就一定办成。养父说，我也这么想，要不我们就不来了。

我和养父都感到，不管我落户的事能不能办成，但我们来上海是来对了，因为姍梅阿姨的身体状况也需要有人来照顾了。养父认为，仅为这一点我们也该来上海！

在弄堂边上有家小旅馆，姍梅阿姨已在那儿的地下室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间，养父可以暂住在那儿。我同姍梅阿姨一起住。姍梅阿姨和我陪养父去那家旅馆看了看房间。养父说，我十二岁离家在江湖上闯荡时，在车站里，屋檐下，桥洞旁都睡过。这不比那时强多了？不过这里面咋这么潮？他看看那扇紧贴着街面的小窗户，外面正在滴滴答答地下着雨。

几天的旅途虽很劳累，但我睡不着，一方面是因为激动，另一方面却因来上海后命运未卜而感到惆怅。我思绪万千，在我身边已睡熟的姍梅阿姨在沉重而吃力地打着鼾。她一身虚胖的肉松弛地瘫在床上，她机体中的那些因长期的劳苦而受损的部件仍在艰难地支撑着她

的生命,我感到她很可怜。她和我妈经历的那个岁月已经逝去了。我妈已长眠在新疆农场那块长满红柳和芨芨草的坟地里了。姍梅阿姨虽回到了上海却仍活得这么的艰难。她们错过了生命中多少美好的东西啊!但她仍在为别人着想,为我的今后着想。我很感激她,还有我的养父。在怎样抚养和教育我的问题上,她和养父之间也常发生一些争执。养父是按照老家的那套习惯来抚养我的。从我两岁起,他就放任我在外面野。那时他在队上的马厩里干活,我就在马厩前的泥土地里乱滚乱爬,有时钻进马厩里在粪堆里挖小虫子玩,还在马的四腿间钻来钻去。那些马好像知道我是谁似的,同我很友好。我甚至在一匹刚下过崽的母马下仰头含着它那长长的奶头吮吸,母马就亲切地扭过脖子低下头来看我。我是靠喝牛奶和羊奶长大的,在我半岁时,由于队上牛奶供应紧张,养父又经常要出车,弄得我时常饿肚子,养父经队领导许可,养了只母羊。开始养父把奶挤到奶瓶里让我喝,后来大约是活儿太忙,我又能在炕上或地上爬了,他索性把羊赶到我身边,让我含着羊的奶头吃,一天数次。以后一到时间,母羊就会咩咩叫着自己顶开门,走到我身边把奶头凑向我,由此我对动物的奶头也有了一种亲切感。有一次我钻进一片骆驼刺中回来,大腿上扎进了好几根刺,疼得我哇哇乱叫。养父就帮我拔掉刺说,你瞧,这不没事了,以后你就自己拔。我五岁时,养父就让我捧着个大瓷碗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穿过一块长满红柳的荒地到有一公里多远的队上大食堂去打饭。姍梅阿姨对这一切都向养父提出过不同意见,说要是小娜是你亲生女儿,你就不会这样待她。养父说,可我爹就是这么待我的,三岁他就让我背着个小箩筐到山坡上给羊打草,十二岁就让我离开家门自谋生路,我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娇惯的孩子长不大,从小就能吃苦的孩子长大后自己就会让自己活出滋味来!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在与一个同学的争吵中我才知道养父不是

我亲爹。回家我就哭着问养父说，爹，同学说你不是我亲爹。养父说，对，不是。我说，那我亲爹呢？养父说，你妈死时没告诉我。我说我要我亲爹。养父说，你亲爹是谁我不知道咋给你去找？又说，你在班里的成绩是第几名？我说第五。养父说，第五名以下的同学都没亲爹亲妈？我说不，都有！养父说，这不结了？有亲爹亲妈的同学还不如你呢，人有没有出息，不在有没有亲爹亲妈，而是要靠你自己！

养父有过一次结婚的机会。

那时马厰紧靠着畜牧排的住宅区，那儿有两排平房，东西走向一排，南北走向一排，组成一个“冂”字形。东西走向那排房子的第三间住着个女人叫王彩菊，长得很漂亮，苹果脸，大眼睛。养父虽然十二岁就外出闯荡江湖独立谋生了，但他在女人跟前却一直很拘谨，因此，到三十出头还没追上对象。王彩菊十八岁结的婚，四年生了三个女儿。当第三个孩子生下后，她那当羊信的丈夫突然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全身没劲，几个月下来人瘦得像一把干柴，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治好他的病，从此就一直在家躺着熬日子。一年、两年、三年……顽强的生命就是不肯从他身上离开。王彩菊拉扯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真叫艰难。有一年冬天，养父赶着马车路过她家门口，看到王彩菊那个才五岁的大女儿正握着把柄比她人还长的斧子在吃力地劈着柴火。养父就停下车跳下去帮那女孩劈柴火。王彩菊看到了，等养父劈好柴， she就把养父拉进屋里，给他端上了一碗搁着两个煎蛋的面条。从此养父时不时地去她家帮忙，她也时不时地把他叫到屋里吃碗面，两人渐渐就有了感情。在养父收养我的第二年，王彩菊的丈夫终于熬完了老天爷给他活在世上的岁月，走了。一年后，王彩菊就商量着与养父完婚的事。就在那时，王彩菊郑重其事地向养父提出，要把我送到别人家去。她说，我不是不喜欢小娜，而是我已有了三个孩子，咱俩结婚后，我怎么也得给你生一个，再加上小娜，拉扯着这么多孩子，往后的

日子怎么熬？我已给小娜物色了一家好人家，老两口心肠好又没孩子，两个人的工资也高，小娜过去可就享福了，干嘛要小娜跟着我们受罪呢？养父觉得她讲的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但当那对老夫妇把我抱走后，养父突然感到了一种火烧火燎的失落感与负罪感，他耳边也一直响着我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熬到晚上，他感到精神都快要崩溃了，而且还看到我妈那怨怒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他连夜赶到老夫妇家把仍在哭喊的我抱了回来。

四个月后，王彩菊与邻队的一个比她大二十岁的男人结了婚。完婚那天，她非要养父赶着马车送她走。天上飘着雪花，马车轮压在松松的积雪上发出嗞嗞喳喳的声响。当养父看到来迎王彩菊的男人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时，养父的心流泪了。当养父赶着马车回队上时，他把车赶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然后跳下马车冲进林带里，跪在积雪上，把冰凉的雪往脸上脖子上抹，然后伸直双臂冲着满散着雪花的天空喊，娘哎，我的娘哎——他把王彩菊从他心中喊走了，他把对我妈和我的爱永远地喊在了心里……

三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昏昏沉沉地似乎刚睡着，姍梅阿姨就轻轻地穿衣起床了。她拉开灯，我眯开眼疑惑地看着她。她说她要的菜场买菜去。我说我陪你去，她把我按住说，你睡吧。但我趁她洗漱时还是起了床，那时才凌晨三点半。雨还在下，天空一片漆黑。走出弄堂，向左拐弯，走上二十几米，再左拐进一条小马路，路两边都是小吃店。再走过十几家门面后，就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而这时菜市

场里已是灯光闪烁,人群熙攘,话声震天了。姗梅阿姨说,她每天都是这个时候来菜场买菜的,当然主要是来买鸡蛋,这样可以保证她摊出的煎饼果子里的鸡蛋都是新鲜的。隔天的鸡蛋她情愿留下自己吃也上不上摊子。买好菜后就又到路口的大饼油条摊买下油条,回到家她就忙着和面,生炉子,在调料盒里装上精心配制好的各式调料。由于她摊的煎饼果子干净味道又好,所以生意倒也不错。等一切收拾好,已是早晨五点多钟了,东方也微微地透出了些光亮。我帮她推上小车,把摊位摆在弄堂口的一块空地上,那儿还有其他一些摊位,卖豆腐脑、卖馄饨、卖葱油饼、卖粢饭的。他们都是一些退休人员和下岗工人。生意可以做到十点多钟,到那时姗梅阿姨才收拾好摊子回家做中午饭,那时她就显得有些精疲力尽了。但回到家后,为了能使我们吃上顿丰盛的接风饭,她又忙着宰鸡、拔毛、开膛、洗菜、刮鱼鳞……我看着她感到很难受,就说,姗梅阿姨,我来做吧,你在边上指点着就行了。但她眯着疲倦的眼睛朝我一笑说,还是我来吧,我自己做着心里踏实。劳碌命的人就是这样,无论命运把他抛在什么地方,一辈子只知道自己辛苦,但得到的报偿却往往是艰难与贫穷。姗梅阿姨在炒菜时我把这些情况讲给养父听。到吃中午饭时,养父看着满桌子的菜感动而歉疚地说,姗梅,从明天起,你的活儿由我和小娜来做。姗梅阿姨苦笑着摇摇头说,这点小生意养活不了我们三个人。你不知道上海的开销有多大!养父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喝了口酒说,我们有办法养活你的。姗梅阿姨一笑说,现在我还不到那种地步,但你和小娜来了,我什么也都有了。说着,眼泪便溢满了眼眶。那天,姗梅阿姨特地为养父备了上好的绍兴黄酒。但养父从没喝过,喝了口说,这酒咋有一股马尿味?姗梅阿姨扑哧笑了说,上海人都爱喝这种酒。要不,我给你另买白酒去。养父说,别,我既到上海来了,让我也习惯习惯上海人的口味吧。

从少年时就闯荡江湖的养父,到哪儿都有让自己生存下来的本

领。我记得我小学快毕业时，农场经济也进行了改革，养父承包了一个谁都不愿承包的老果园，而且还同队上签订了十五年的长期合同。人家都笑他傻。可养父说，世上的事全靠人拾掇。他淘汰了一些老果树，栽上新品种，然后嫁接、剪枝、施肥、除草，在果园里搭了个窝棚，天天泡在果园里，精心护理了三年后，累累的果子就坐满了果树。由于果子的品种好，每当果子一成熟，果园门口就排满了汽车。几天功夫，果子就拉完了。价格也比别的果子高。人人都说我们家大发了。但养父不动声色，以前怎么过日子现在也就怎么过。惟一的变化是我常有新衣服穿；清明给我妈上坟的贡品也多了。养父守着中国人过日子的信条：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因为花钱容易挣钱难，所以挣上十分花五分，留下五分防饥荒。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年年往上升，虽然政府鼓励消费，可银行里的存款余额还是一个劲地往上涨，这都是像我养父这样的人给闹的。

到上海后的那几天，养父总是早出晚归。我知道他准在寻活儿干。果然到第四天，他在小菜场边上的一家牛肉面馆里找到了一份活儿。他说他十五岁时在兰州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当过两年学徒，学着拉的一手好面。他在那家面馆亮了一下手艺，就把原先那个冒牌的拉面师傅比下去了。老板说，试用一个月，酬劳一千，正式用后每月三千。老板又说，但你得到医院去体检，在饮食上阿拉上海防疫要求是老严格的。

我们在上海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据姍梅阿姨讲，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过去是上海滩上有钱人家住的，盖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花园洋房。但后来人口多了，有些中等人家也涌了进来，于是就盖起了不少石库门房，因此有些弄堂就分成了甲弄乙弄，或者前弄后弄。我们这条弄堂的前弄就是乙弄，都是一些石库门房，而后弄就是甲弄，是一排安着大扇门的花园洋房。姍梅阿

姨说,你妈家就在甲弄的19号。那天卖完煎饼果子,姍梅阿姨就领我到我妈家去看。两扇刷着深红色漆的大铁门紧闭着,我好奇地从门缝往里看,那里有一栋已显得很陈旧的红砖砌的三层小楼,楼前有一片绿地和两株树。我妈就出生在这栋楼里一直长到十八岁。但自她去新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大约是那些接连发生的丑闻使她觉得无脸再回来。我妈真是活得太可怜、太凄惨、太遗憾了。现在只有我代妈妈来看看这栋老房子了。想到这里我鼻子就有些发酸。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真的很难理解妈妈去新疆的那份动机和理由。用姍梅阿姨的话说,那时在居委会干部的动员下,不去是不行的。但后来我知道当时在上海的一些知识青年也让居委会的人一次次动员过,但他们硬是不去,现在不也在上海活得好好的吗?可养父说,那一代人是那一代人的事,现在是现在人的事,那脑袋里想法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是,别埋怨你妈,你妈呀……他摇摇头,不说了。

由于姍梅阿姨与我妈有着一份姐妹情,两家又同住一条弄堂里,因此对我外婆家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她告诉我,我外公年轻时留过洋,是个经济学博士,回到上海后在一家外国公司当帮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外资企业里的白领阶层。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却属于“洋奴”、“汉奸”这样一类的人物,但还是被一家经济研究机构所留用。1958年大跃进时,他在经济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接着就被逮捕、判刑,发配到青海,第二年就死在了青海的劳改营里,接着全家也就跟着倒霉。我妈在中学里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可考大学政审没有通过,就被动员去了新疆。我妈有个比她小五岁的妹妹叫田丽娜,初中没上完就“文化大革命”了,家里又一次遭劫。她和外婆被赶出了小楼。而那时,我妈和姍梅阿姨已在新疆了,处境已相当糟糕的我妈就再也没同家里联系过。姍梅阿姨说,也许真是她本人和家庭的这一系列不幸,是我妈最后选择了轻生的原